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编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

第十五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

第十五辑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岚	刘玉才	安平秋
杨 忠	杨海峥	吴国武
董洪利	漆永祥	廖可斌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十五辑 /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301-27696-9

I. ①北… II. ①北… III. ①古文献学—研究—中国—丛刊 IV. ①G256.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5878 号

- | | |
|-------|--|
| 书 名 |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十五辑
BEIJING DAXUE ZHONGGUO GUWENXIAN YANJIU ZHONGXIN JIKAN |
| 著作责任者 |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编 |
| 责任编辑 | 王 应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7696-9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zpup@pup.cn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6449 |
| 印 刷 者 | 北京大學印刷厂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7.5 印张 320 千字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45.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目 录

从经学向文学

- 一个中国文学研究者的《论语》阐释 刘 萍(1)
- 焦循手批《孟子注疏》考述 王耐刚(14)
- 叶适《大学讲义》(外二种)辑考 桂 象(28)
- 论梁益《诗传旁通》之体例及诠释特色 付 佳(50)
- 北京大学李盛铎旧藏之和刻本《诗经》类文献叙录 赵 昱(58)

为六书辩护

- 兼论“四体二用”之说不可信 徐 刚(68)
- 陈澧《切韵考》切上字校勘中的“同音”问题
- 兼论陈澧关于切上字的校勘模式 李林芳(82)
- 《燕行录》诸家释解汉语字词例析(50条) 漆永祥(95)
- 古籍整理研究中所需注意的方言口语问题
- 以许衡著作中“多咱”“待见”两个词语的用法为例 许红霞(115)

从清华简《系年》看卫国的初封与迁都 刘 瑛(119)

以古言征古义

- 浅谈日本古文辞派诠释汉籍的理论及方法 杨海峥(125)
- 武英殿本二十四史翻刻翻印考述 张学谦(136)
- 《类说》与南宋坊本类书
- 兼议《类说》的工具性 李 更(145)
- 《高似孙〈纬略〉校注》商兑 胡双宝(174)

胡寅《斐然集》编纂与刊刻略考 陈晓兰(189)

中华书局本《五峰集》再商榷 班龙门(198)

林之奇生平交游考 俞昕雯(214)

范成大《张公挽词》为张宗元作 任 群(226)

江湖派诗人小集的编刊(一)	王 岚(234)
《平妖传》二十回本与四十回本关系再探 ——以俗字、语法与插图为中心	林 莹(253)
论明刊《西厢记》文本体制的传奇化	陈旭耀(270)

从经学向文学

——一个中国文学研究者的《论语》阐释

刘 萍*

【论文提要】 近代日本中国学大家吉川幸次郎以其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而著称于学界。然细致梳理其学术脉络则不难发现,对于经学典籍《论语》的研究,亦构成其学说著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吉川幸次郎的《论语》研究,一方面在方法论上乘承京都学派的治经传统,注重文献的考订,强调“诚实地理解中国”,另一方面对《论语》的文学性的解读,凸显出其作为中国文学研究者的独特视角。本文尝试就吉川幸次郎穿行于经学与文学之间的《论语》解读作出若干分析。

【关键词】 吉川幸次郎 《论语》 经学 文学

吉川幸次郎(1904—1980)是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家,其代表性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元曲研究和中国古代诗文研究上。因其学养之深刻,著述之丰厚,吉川幸次郎获颁法国学士院为表彰世界性东洋学者而设立的儒莲奖^①,晚年更拥有被视为“吉川天皇”的学术地位^②。因此可以确认,在日本中国学界,吉川幸次郎称得上是具有国际意义的中国文学研究第一人。这样一位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的大学问家,对于《论语》的整理研究,也成为其学术著述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对《论语》的文献整理,到对《论语》的文学性解读,吉川幸次郎的《论语》阐释,实践着从经学向文学的转换。

一、吉川《论语》学的古典解释学传统

吉川幸次郎青年时代就读于京都大学,师从狩野直喜、铃木虎雄,深受其

*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副教授。

① 获得此奖的日本学者多为东洋史专家,如羽田亨、藤枝晃、宫崎市定、神田喜一郎等,吉川幸次郎是其中唯一一位中国文学研究者。

② 高岛俊男《书与中国与日本人》,东京:筑摩书房2004年,第338页。

影响^①。在近代日本中国学史上,以十分尊重清代考据学的狩野直喜为代表,为纠正江户汉学奉“朱子学”为圭臬之偏颇,倡言以“古典解释学”立场对待中国古典,也即主张应将训诂之学置于与义理之学并重的位置。在其后的半个多世纪,主张文献考订,推行原典研究,成为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实证主义学术特征^②。吉川幸次郎大学毕业后曾随狩野直喜到中国留学,学成归国后又作为狩野直喜主持的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经学文学研究室”研究员,参与《尚书正义》定本的修订翻译,这项长达六年(1935—1941)的文献整理工作,被吉川本人视为“一项了不起的工程”,而完成于1959年的《论语》译注,更可以当作吉川幸次郎在中国古典经学文献整理研究延长线上的劳作。吉川幸次郎明确提出要“诚实地理解中国”^③,这一主张恰好体现了京都学派的古典解释学传统。

初版于1959年的《论语》(上、下),虽为朝日新闻社“中国古典选”中的一部,但与同时收入的其他选本不同的是,这部《论语》(译注)并非一般性通俗解读之作,而是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准,因而多次再版发行^④。在广泛的受众群中,既有普通读书人,也有专业人士,其影响颇为卓著,被誉为是一部“可以令人体味到无以言表的阅读快感”^⑤的读物。

这部上下两卷本的《论语》译注之作,是吉川幸次郎在对中国古典作品的系统性研究,特别是在对中国儒学思想也包括对日本儒学的深入比较中完成的。一方面他充分继承了前辈学者既有的阐释成果,另一方面也以长期不辍的热情,展开了堪称细致周密的文本解析与翻译,使之成为体现其扎实严谨的文献学方法论的具体实践。其具体成就可以概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博采众家之说,古注、新注并重

为了“诚实地理解中国”,吉川幸次郎十分留意广泛吸纳中日两国历来的注释成果,兼采众家诸说。他明确表达了完成这部《论语》译注的“宗旨”:

我此番要对《论语》进行的逐条解读,并无意以新说而超越历来诸家

^① 1923年,吉川幸次郎毕业于第三高等学校,同年4月升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文学科,其时于文学科执掌教鞭的狩野直喜(1868—1947)、铃木虎雄(1878—1963),皆为近代日本中国学史上的中国文学研究大家,他们对吉川幸次郎日后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给予了最初的学术启蒙。

^② 日本学术界向以“京都学派”指称近代以来形成的以京都大学学人为核心的各学术研究体系,如哲学京都学派、考古学京都学派等等(参见竹田笃司《物语“京都学派”》,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01年)。中国学者则尝试就其学术内涵特征,对以京都大学为核心的“中国研究”加以分析把握,从而以“实证主义”相指称(参见严绍疆《日本中国学史稿》,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9月)。

^③ 吉川幸次郎《尚书正义》“译者序”,东京:岩波书店,1940年。

^④ 1965年收入“新订中国古典选”再版刊行。后又屡次收入“朝日选书”、“朝日文库”等系列刊本中。从开本大小到装订样式,都不断有所变化。

^⑤ 井波律子:“我喜爱的书”,《朝日新闻》1999年3月7日。

之说。《论语》是我们的祖先,更广阔意义上说是东方各国的祖先们所广泛阅读过来的文献,正因如此,就要基于祖先们普遍接受下来的阐释来阅读此书。我们要以此为宗旨,至少要将之作为原则性的宗旨。^①

在对《论语》进行日语译注之前,作为行将展开的文献整理之先行研究,吉川幸次郎首先回顾和总结了中国经济史以及日本汉学史上中日两国历代学者有关《论语》的注释之作,对历来流行的各家注本,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表明了其基本的取舍立场。如,在论及“古注”魏何晏《论语集解》时,吉川幸次郎充分肯定了该注释文本的重要价值。他说:

何晏对汉代以来既已盛行的各家注释加以选择取舍,汇集汉学者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魏学者陈群、王肃、周生烈之说,各记其姓名,列举引用。一般认为,作为思想家,何晏醉心于老庄之学,故在阐述自家之言时,不免有据老庄之说加以歪曲之嫌。但是,作为现存的注释,《集解》年代最古,中国至唐,日本经奈良、平安两朝至镰仓末期,读《论语》者皆以此为首要依据。^②

《论语集解》之外,吉川幸次郎用相当的笔墨述及皇侃的《论语义疏》。这当然首先是因为《论语义疏》不出南宋即已亡佚,但在日本却一直得以保存、流传不废之故。1750年,获生徂徕弟子根本逊志据足利学校所藏旧钞本出版印本,“后传至中国,学界震惊”。乾隆开四库馆时,鲍廷博据此刻入《知不足斋丛书》,并收入《四库全书》,“中国学者才得以再睹真颜”。吉川幸次郎不无自豪地称此为“过去的日本贡献于中国文化的最大业绩之一”。^③当然,吉川同时也分析指出了利用《论语义疏》时需加以留意之处。无论在征引何晏之后至梁诸说时,还是在阐述自家之言时,《论语义疏》都与何晏《集解》相类,即所谓援道释儒,亦以道家思想阐释《论语》,故吉川幸次郎指出“作为《论语》注释,《论语义疏》略呈奇矫之论”。^④

对于邢昺的《论语注疏》,吉川幸次郎将其与《论语义疏》同样归类为“古注”,视为“古注的再注释”。对于收入《十三经注疏》中的这部《论语注疏》,吉川幸次郎认为,作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其注释可谓“稳健妥帖的再注释”,虽“缺乏新意”,但仍然“称得上是《论语》古注的权威译本”。^⑤

在对《论语》的古注诸本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时,吉川幸次郎也对《论语》“新

① 吉川幸次郎:《论语上》第Ⅳ页,朝日新闻社,1965年12月。

② 吉川幸次郎:《论语上》第Ⅴ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吉川幸次郎:《论语上》第Ⅵ页。

注”，即南宋朱熹《论语章句集注》，给予了同样的关注，并作出了辩证的分析。

宋代理学的兴起，昭示着中国古代学术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儒家经典开始作为文本资料而被加以形而上的建构，这场重读经典、重新诠释古典的文化风潮无疑由朱熹而总其成。在朱子的学术话语体系中，显然是将“四书”置于“五经”之上的，而其中《论语》最为重要。因此，吉川幸次郎高度评价朱熹为“近千年间中国最伟大的学者”，称其所撰著之《论语集注》是“极其优秀的注本”，“不仅在中国的元明清时代，甚至于日本的江户时代，都是作为国定教科书而获得极大普及的”。^①同时，吉川幸次郎也指出，由于朱熹的努力，实现了从之前“以孔子所规范之种种为圭臬”向着“以孔子其人为楷模”的转变。^②也正因如此，吉川分析了朱子《论语集注》的问题所在。他说：

尊奉《论语》而以之为人间规范，这种意识时而会造成逼仄死板的解释；因为拘泥于其所持有的形而上的体系，阅读时就不免产生出牵强附会的解读；又由于对古代语言学知识的欠缺，误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凡此种种皆为其不足。^③

在吉川幸次郎看来，其所指出的《论语集注》的上述缺陷，后来不仅为清代考据学家也为江户时代的日本汉学家所排斥并予以克服。

《论语集注》随禅僧的频繁往来，于镰仓末期传入日本，至室町时代（1390—1595），在以古传经的清原家后继学者的著作中，也折中地吸收了朱子的主张。进入江户时代以后，德川家康开始更进一步地起用以藤元惺窝弟子林罗山（1583—1658）为首的朱子派学人来振兴文教，朱子学遂一跃成为幕府时期的官方之学。其后，以倡导古学、排斥宋学而著称的伊藤仁斋、获生徂徕的《论语》注释又日渐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可以说，至江户时代后期，《论语》的读者群甚至延及一般的江户庶民，他们所面对的《论语》注释文本，既有长于训诂的“古注”，亦有重在义理阐释的“新注”。

关于日本的《论语》古注，吉川幸次郎深深服膺于伊藤仁斋的《论语古义》和获生徂徕的《论语微》，在其《论语》译注中，对此二注本多有征引。此外，有关日本的训点本方面，吉川幸次郎参照最多的是江户后期的儒者后藤芝山（1721—1782）本于朱子《论语集注》所作的训点，对林道春（罗山）以及山崎闇斋（1618—1682）、佐藤一斋（1772—1859）等人的汉文训解，亦间有参考。至于本自何晏古注《论语集解》的日本训点本，则参照了依据江户末期北野宫寺学堂古写本翻刻的覆刻本之训点。总之，对于上述日本江户时代汉学家的《论

① 吉川幸次郎：《论语上》第Ⅵ页。

② 吉川幸次郎：《中国人的古典及其生活》，岩波书店，1944年8月。

③ 吉川幸次郎：《论语上》第Ⅵ页。

语》“古注”与“新注”，吉川幸次郎亦皆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当然，也并不墨守成说，译注中兼下己意处亦多有之。

2. 尤为尊重清代考据学家注释成果

作为日本中国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学者，吉川幸次郎对其前辈学者诸如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等人的最直接的学术传承，莫过于对中国清代考据学家的尊重。

有清一代，随着乾嘉考据学蔚为大观，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有关《论语》的文献整理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成果，归纳起来大致三个方面：一是辑佚之作，二是校勘考异之作，三是综合治理之作。其中，第三种综合整理之作，多为以注释为主要内容，同时兼及考证、校勘。其展开的路向又根据所涉对象不同而大致分为两类。一方面，由于语言文字学和考据学获得的新发展，清代学者对唐宋时期的《论语》疏解感到不满，对所暴露的粗疏、失误乃至褊狭，开始相续补疏或作新疏。另一方面，出于汉学与宋学之争，作为宋学代表作的朱熹的《论语集注》，也成为汉学家抗拒与驳证的对象，刘宝楠（1791—1855）的《论语正义》即属此类。

吉川幸次郎非常注重清儒的《论语》注释，为此，他十分推重刘宝楠对清代乾嘉学者《论语》再注释的总结：

对朱子“新注”之不足加以检省并予以纠正，这种尝试在中国，自十七世纪中期明末清初之际即已开始，至十八世纪后半乾嘉时代达于高潮。对于久失关注的“古注”，即何晏《集解》，也便开始了重新探讨。加之当时古代语言学知识获得了长足发展，因而可以不必囿于旧说而提出新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便是这一时期之末的一部集大成之作。^①

吉川幸次郎还特别指出，《论语正义》在形式上虽然与皇侃的《论语义疏》、邢昺的《论语注疏》一样，都可视为何晏《论语集解》的再注释，但是刘宝楠对《论语》的注释，却并未局限于何晏，而是吸收了有清一代更新、更多的研究成果，其“文献整理之功相当卓著”。吉川幸次郎甚至利用访华之便，专程前往刘宝楠故居（江苏宝应县）访问，其对刘宝楠的敬重可见一斑。

此外，在《论语》（译注）中，吉川幸次郎还多处征引了刘宝楠之外的其他清代文献学家的注释《论语》之说，诸如王引之的《经传释词》、钱大昕《潜研堂文集》、顾炎武《亭林诗文集》、阮元《揅经室集》等等，表现出对中国清代考据学家的充分尊重。

^① 吉川幸次郎：《论语上》第VI页。

3. 对日本汉学与近代日本中国学的继承与发展

吉川幸次郎特别注意到江户时代日本汉学家的《论语》研究业绩,对其中著名的古义学派(堀川学派)开创者伊藤仁斋(1627—1705)与古文辞学派(萱园学派)创始人荻生徂徕(1666—1728)的《论语》研究,备加推崇。如前所述,在对《论语》进行注释翻译时,吉川幸次郎对伊藤仁斋《论语古义》和荻生徂徕《论语徵》的注释成果多有征引,因为在吉川幸次郎看来,“这两部注释即便混入中国的注释书之中,也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优秀的注释”。可以说,吉川幸次郎的《论语》研究就是在吸收这些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

伊藤仁斋对《论语》上、下论的划分,被吉川幸次郎誉为“是一个了不起的见解”。因此在译注《论语》时,在篇章结构的形式上,吉川幸次郎选择了接受伊藤仁斋“上下论”的划分方法。他把《论语》分成上下两册,以“乡党篇”为界,之前的十篇收入上册,之后的十篇收入下册,这种划分显然是直接仿照《论语古义》而来,受伊藤仁斋影响的痕迹清晰可辨。在吉川幸次郎看来,“尽管伊藤仁斋的古代汉语知识,不似在他之后到来的清代乾嘉时期学者那么丰富、那么正确,但是仁斋往往是在以一个并非仅仅是哲学家,更是语言学家的敏锐直觉,把握着《论语》的原义”^①。特别是考虑到伊藤仁斋的主要著述活动,处于与清康熙时代大致相同的时期,当时中国学者对于朱子《论语集注》的反思尚不充分,因此,吉川幸次郎认为,在排除朱子臆说,阐明《论语》古义这一点上,伊藤仁斋的《论语古义》走在了中国学者的前面。

对于荻生徂徕的《论语》研究,吉川幸次郎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荻生徂徕在学问上的根本态度是“明古言而后定古义”,指出荻生徂徕“所谓之‘古言’,即指古代语言的状态,特别在于其作为情绪表达的方面。只有透过这样的‘古言’,所谓的‘古义’也即古代的思想才能够得到清晰地把握”。因此荻生徂徕对于朱子的质疑比伊藤仁斋更甚。为此,吉川幸次郎对于《论语徵》的成书及影响,做出了进一步的分析:

这部书命名为《论语徵》,就是要全部徵之古言,即考察一个一个的语汇在古代的用例,特别是其表明情绪时的用例。如此徵之古言,以之作为证人。抛开其自负的一面不论,荻生徂徕的古汉语知识确实要比伊藤仁斋丰富。且徂徕所处时代正值清雍正年间,古典语言学的研究尚未正式开始,若与随后发展起来的乾嘉考据学家相比,徂徕的学问精密程度即使达不到那样的高度,但比之同时代的中国学者或许是所差不多的。^②

^① 《论语》,《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四卷,第10页,东京:筑摩书房,1974年。

^② 《论语》,《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四卷,第11页。

当然，吉川幸次郎也注意到荻生徂徕在学术上的弱点，他指出，虽然与伊藤仁斋一样，荻生徂徕也有着相当敏锐的源于异文化背景的学术直觉，但是由于过度的反应机敏，其言说也不免时而陷入过分的奇矫、尖锐之中，这一点多少令人感到遗憾。

在对《论语》的日语译注上，吉川幸次郎毫不讳言地坦承“受到伊藤仁斋、荻生徂徕影响的地方非常之多”。^①与此同时，作为新一代的日本中国学家，吉川幸次郎的学术见识及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仅继承并超越了江户时代的汉学家，在推动近代日本中国学的发展上，吉川也以《论语》译注作为范例，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和贡献。

吉川幸次郎对《论语》的翻译注释，与之前参与译注《尚书正义》时一样，不是按照以往的对于中国古籍的“汉文训读”方式，而是完全采取现代日语译，也即“汉文直读”，这在方法论层面而言无疑也是对京都学派学术传统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所谓“汉文直读”是相对于“汉文训读”而言的。从日本汉学发展的一般趋势看，始有“音读法”，继而产生了“训读法”，并自平安中期以后，长期以“训读法”为学界主流。至江户时代，这种局面开始有所松动。荻生徂徕就曾提出“读法革新论”的主张，认为“汉学教授法当以中国语为先”，应“教之以汉语俗语，诵之以中国语音，译之以日本俗语”，而绝不能采用“和训回环”即“训读”的读法。作为一代汉学名家，荻生徂徕提出的这一革新之论，无疑是具有时代见识的，但是在徒以文献认识中国的江户汉学时代，实现对中国文献的“汉音直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直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开始形成之际，当日本中国学家纷纷亲抵中国，置身与汉文化的直接体验中的时候，“训读法”的坚冰才开始呈现融化之兆。1921年，京都学派的年轻学人青木正儿(1887—1964)在《支那学》一卷五号上，率先发表了题为《我国支那学革新之第一步》的论文，后在收入其最早的中国文学研究专著《支那文艺论藪》时，改题为《汉文直读论》。这种以汉语读音朗读中国诗文的所谓“汉音直读”的方法，对于今日的中国学研究者而言实乃区区小事，不足挂齿。然而对于二十世纪初的近代日本中国学界来说，青木正儿的《汉文直读论》无疑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②。

无论从个人私谊还是从学统渊源，吉川幸次郎都与青木正儿有很深的关系。二人先后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中文科，都曾师从狩野直喜、铃木虎雄，

^① 《关于〈论语〉》，《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105页。

^② 刘萍：《儒学文学观的破灭——青木正儿的儒学批判》，《金泽大学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研究室纪要》第7辑，2003年。

同为京都学派的重要学者。吉川幸次郎在高中求学期间,正值青木正儿发起“支那学社”、主持《支那学》編集工作之际,吉川决定投身京大正是受到青木的鼓励与支持。在治学方向、理念乃至方法上吉川都深受青木影响。在青木正儿的《汉文直读论》发表十五年以后,吉川两度对“汉文直读”法加以践行袭用。先是于1935年至1941年,连续六年集体以汉语阅读原文、讨论,最终写成定本的《尚书正义》;继而便是关于《论语》的日语译注。在1950年至1958年间,连续九年,平均隔周一次,以共计200次的口述、记录方式,《论语》译注终获完稿。由是观之,吉川幸次郎所自称的“不是哲学家而是文献学者、语言学者”^①当不为虚言。

二、吉川《论语》学的文学性解读

对于日后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吉川幸次郎来说,《论语》首先是一部经学文献、一本伦理教海的书籍,而非文学文本,因此,作为其“前半生最重要的工作”^②,吉川首先是以一个文献学者的立场,从对中国古籍的整理翻译入手的。然而吉川幸次郎与《论语》最初的邂逅却又与文学不无关系。与上一辈以及同辈的许多人不同,吉川幸次郎初次接触《论语》是到了二十多岁考入大学,确定了选择以中国文学作为治学方向以后才开始的事。当时京都大学的学生对《论语》乃至孔子的看法,是有着过度批评的倾向的,在这种时代氛围影响之下,吉川幸次郎自然也对《论语》无太大兴趣。后来,还是出于学习上的“技术性”需要,吉川幸次郎才“勉为其难地读下来的”^③。但是,读过若干章之后,吉川幸次郎心中,《论语》一改之前被他预设的种种阴郁沉滞的想象,而变得生动明朗起来,以至于到了令他“为之瞠目”的地步。那以后的数十年里,《论语》一直是他的掌中“爱读书”。吉川幸次郎曾经多次在不同场合说过,中国的古书中,“我打从心底喜欢的有两个,其一是杜甫的诗,另一个就是《论语》”。^④

这场貌似偶然开始的阅读,其中却不乏必然。吉川幸次郎有关《论语》的研究工作,与其杜甫研究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进行的。可以说吉川对杜诗的体味与对《论语》的思索,二者是彼此交融、相互渗透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中国诗歌文学的感动,直接影响并刺激了吉川幸次郎对《论语》文学性的理解和解读。他认为学术与审美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因此,对《论语》的喜爱,不

① 《关于〈论语〉》,《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294页。

② 金文京:《六十年前的书信——〈吉川幸次郎全集〉未收之文》,《ちくみ》318,第20页,1997年9月。

③ 《中国的智慧》,《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19页。

④ 《关于〈论语〉》,《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295页。

仅因为其思想上的积极开朗,更在于其显露的文学之美,尤其是后者,这一给他带来独特审美体验的辞章之魅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要因。

1. 孔子诗教说与《论语》的文学功能

吉川幸次郎最初接触到《论语》,首先为之深深折服的,就是“《论语》文章表现力上的强悍”。因此在对《论语》的研究中,吉川幸次郎也一直在以文学鉴赏的目光,眺望孔子以及古代中国人的所思所想,感受其文学审美的洗礼。

与对仁者孔子的认识相关,吉川幸次郎认为,孔子在“文化主义”《论语》中表现出关心政治的同时,也把对文学、艺术的关心,同样当作人类的义务而予以了同等重要的对待。这种对文学、艺术的关心,最好的明证就是,在孔子教之于弟子的诗、书、礼、乐“四教”中,诗与乐占到一半的份额。吉川幸次郎从对文学的整体认知角度,对孔子的“诗教”予以评说:

《诗》三百并不都是感怀一类作品。孔子对政治的强烈关心,时而也会把这些民谣从原本的意义脱离出来,作为政治批评、社会批评的资料加以利用。但是,只要不读诗,人就会如同被蒙上眼睛一般,孔子就是这样教导他的儿子的。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可以说,确认中国文学的功能,这始于孔子。^①

吉川幸次郎进一步指出,孔子对《诗》的重视,实际上在孔子晚年编定《诗经》以前就开始了,如《论语》中有“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此外,《论语》还记录了孔子对诗的社会作用的高度概括之语,“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论诗之“兴观群怨”说,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源头。吉川幸次郎高度评价孔子第一次确立了文学在中国历史上的价值,指出这种对文学的重视,在孔子同时期的其他学术流派中都不曾见到,如“道家认为所有人为之事皆为不自然之伪,墨家视音乐为无用之奢侈,法家则以法律为无上之万能,唯有孔子所代表的儒家,独以文学为重”。^②这无疑使其判断兼具了广泛的学术史之比较视野。

吉川幸次郎从宏观的角度,揭示了孔子在《论语》中表达的对于文学的重视以及由此产生的学理层面的价值,这事实上也决定并启发了他对《论语》文学性的微观理解和把握。

2. 《论语》的辞章之美

说到《论语》的文学价值,无外乎表现在语言价值与文章价值两个大方面,

^① 《中国的智慧》,《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41页。

^② 《孔子》,《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123页。

当然,这二者之间又是有交叉的。就语言价值而言,《论语》体裁为语录体,这就决定了它必然使用大量生动的口语,《论语》中的很多语汇和句式,不仅影响到其后的古代汉语,甚至很多流传至今。在语言的使用上,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不仅增添了《论语》的语言魅力,也在刻画人物、描写场景等方面极大地丰富了《论语》的文章表现力。《论语》作为一部文学文本所具有的辞章之美,无疑会令热爱中国文学的吉川幸次郎深受感染并为之倾倒。

对自己的中文水平一直引以为豪的吉川幸次郎,对《论语》的语言价值以及与此连带的文学价值具有格外敏锐的直觉判断,吉川认为,《论语》在表达手法上,堪称文章的典范,因此他尝试从语言的解析入手,做出属于他本人的对《论语》的文章品鉴。

初读《论语》不多时,吉川幸次郎就敏感地意识到,“尽管《论语》是在孔子身后编纂而成的,但从甚至很细微的地方都可以看出,编纂者是在努力尝试把孔子当时说话的语气也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他举《论语》开篇“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为例,在解释了意义之后,对其中特殊的修辞作了如下分析:

(此章)富于特色的地方是“不亦说乎”“不亦乐乎”“不亦君子乎”的反问句的用法。这三句话都是以“不”也即“是不是”这样表达较为强烈地催促对方同意的语气开始的,接着又以“亦”这个表现委婉意味的助词使语气和缓下来,于是整个句子的意思就成了“不是很高兴吗”“不是很快乐吗”“不是君子吗”这样的表达方式了,在感觉上,一方面有着较强的促使对方同意的意味,另一方面也给对方留下了可以自己判断的余地,强势与宽容就这样挥洒自如地被融合到了一起。^①

在这一章的训解中,诸家注本对“亦”字皆未作过多注释,今人多译作“不也”,但吉川幸次郎认为这是沿袭了邢昺《论语注疏》的解读,并不确当^②。前面曾提到,吉川非常尊重清代考据学家,在译注《论语》时,十分留意吸收清人的考据成果,此处对“亦”字的解释,就接受了王引之《经传释词》的解读:“凡言不亦者,皆以亦为语助。”据此,吉川幸次郎认为,此处的“亦”是为缓和语调而加上的一个极轻的语气助词。进而吉川指出,《论语》的编纂者采用了这种“坚定同时又是委婉的引导对方同意的表达方式”^③,表现出他们是在努力试图再现孔子语言的原貌。“尽管当时的口语语气或许也并非如此,但是,如此巧妙地

① 《中国的智慧》,《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102页,筑摩书房。

② 《新订中国古典选2 论语》上,第3页,朝日新闻社,1965年。

③ 《新订中国古典选2 论语》上,第4页。

描写,确实非《论语》莫属。”^①

作为长期浸淫在中国古代诗文、戏曲作品中的大家,吉川幸次郎对于中国古典语言的声韵之美倾心已久。事实上,早在大学求学时期,他就对诸如《礼记》中的“将上堂,声必扬”的铿锵旋律颇为感怀,称这些充满美感的中国文献是“难以忘怀的读物”(《忘れえぬ書物》)。三十年后读到《论语》中的文字时,吉川幸次郎再次感受到了汉语言文字独特的韵律之美、节奏之美。吉川幸次郎列出了下面令他感动的章句:

诸如“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又如“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我认为都是非常美的文章。这在《论语》中算是结尾的部分。历史学家在讨论《论语》的成书时,对结尾的部分作为史实能否成立,表示了很大的疑问。但是无论如何,这些文章是非常美的。^②

在这段文字里,吉川幸次郎连续用“非常美”来盛赞《论语》的行文韵味,足见其受到的感动。徜徉在《论语》的世界里,吉川幸次郎始终怀揣着一颗易感的诗人之心,他曾经说过,“我的《论语》读法有一种偏向,可以说,我是把《论语》当作诗歌来阅读的”。

感动吉川幸次郎的还有《论语》中关于人物的刻画描写。一般说到人物描写,总会被拿来评说的多为《论语》中对孔子弟子形象的塑造,但是最令吉川感动的人物刻画却是《述而篇》中一段关于孔子的对话: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是孔子执着于追求崇高人生理想和高尚人文情怀的真实自况。吉川幸次郎说:“这是我最喜爱的一章,它也是《论语》中描写孔子最栩栩如生的一章。”^③《论语》以记言为主,兼及行事,通过对场景、语境的叙述描写,配合生动的人物语言乃至语调,使人如临其境、如谋其面,从而使人物形象得到鲜明生动的塑造。《论语》在人物刻画上的细腻传神,不仅深深打动了作为读者的吉川幸次郎,同时也让作为《论语》的注释者、传译者的吉川努力将《论语》所蕴含的文学感染力加以最大程度的外化。以本章为例,吉川对此章中“子曰”的内容,作了如下翻译:

孔子说:“子路啊,你为什么不说呢?你告诉他,这个人啊,担心着天

① 《中国的智慧》,《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102页,筑摩书房。

② 《关于〈论语〉》,《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314页,筑摩书房。

③ 《新订中国古典选2 论语上》,第213页。

下的将来,内心激荡,为此连吃饭都忘了。还有啊,这个人他陶醉在自己认定快乐的事情里,乐而忘忧,连衰老就要降临也不挂在心上。你老师我这个人,有着如此理想主义的人格,为什么你没说啊?”^①

很明显,译文中有一些超出原文字面的内容是吉川幸次郎的“再创作”,如“担心天下的将来而内心激荡”“理想主义人格”等等,但是这其中恰恰体现的是吉川本人对孔子其人的理解。在语汇的把握上,句尾的“云尔”,今人译作现代汉语大致分为两类,一作“如此罢了”,语气较为平淡,另一作“(何不)这样说(呢)”,语气稍强。^②吉川幸次郎显然倾向后者,而且他特别强调“云尔”二字旨在“加重语调、加强语气”,于是,特意加译为“你老师我这个人,有着如此理想主义的人格,为什么你没说啊”。

对于吉川幸次郎而言,在中国古代书籍中,《论语》与其说是最有名的文章,不如说是最美的文章。在吉川幸次郎看来,“作为文学,《论语》中值得赏鉴的要素十分丰富。它的语言绝不抽象寡淡,而是对应于各种现实生活的场景,非常生动鲜活,其文章手法也相当漂亮出彩,这些都是作为文学作品所必须具备的条件”。^③吉川幸次郎以一个文学研究家的眼光,从文学鉴赏的角度,发掘出《论语》所具有的作为文学作品的丰富要素和条件,他甚至满怀深情地表示:“我所钟爱的正是《论语》所表现出的如此这般的辞章之美。”^④

结 语

吉川幸次郎的《论语》研究进路,穿行于经学与文学之间,反映了研究者与文本、读者与作品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状态,从而揭示出一种《论语》阐释的可能性——一方面,作为文献学研究者的吉川,在与文本的对视中,始终怀抱对典籍的尊重,同时亦不乏审视的自觉,他广泛吸纳中日、古今各家注释,追求训诂、义理兼重,以坚定的文献学者的立场,完成经典文本在异文化语境下的重塑。另一方面,作为读者的吉川幸次郎与《论语》的关系,与其说是阅读经典,不如说是玩味作品,带着深刻的情感关切,触摸作者,体察其内心,最终在文学的审美世界里获得感知和体认。吉川幸次郎对《论语》文学性的把握,虽然没有十足的透彻、全面,其中亦不乏感情色彩过于浓烈而分析论证稍嫌简约的缺欠,但是,他自称是一个“素人”,虽然阅读《论语》开始得比较晚,但就像他自己

① 《新订中国古典选2 论语上》,第213页。

② 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钱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等。

③ 《关于〈论语〉》,《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103页。

④ 《关于〈论语〉》,《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五卷,第314页。